

Educational
Film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民国教育电影研究

以孙明经为个案

史兴庆 著 Shi XingQing zhu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Educational
Film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i XingQing

民国教育电影研究

以孙明经为个案

史兴庆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史兴庆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657-1044-5

I. ①民… II. ①史… III. ①教育—电影史—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J9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4894 号



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

著 者 史兴庆
责任编辑 吴 磊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魏 东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9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044-5/J·1044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绪 论

国内目前对非剧情电影的研究还比较弱,对于民国非剧情电影的代表——教育电影的研究更少。笔者历时数年,搜寻史料百余种,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勾勒出了“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基本框架,“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一度和我们熟知的“左翼电影运动”并驾齐驱,但后来被历史湮没。

民国教育电影是民国电影的一道绚丽风景,也是中国电影被湮灭的宝藏。如果把当时的戏剧电影比作小说,纪录电影比作散文,那么教育电影就是论文和说明文,它紧扣时代脉搏,贴近民生,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折射出理性与逻辑的光辉,洋溢着人文和劳动之美。

一、教育电影的起源和存在形态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南京为中心的教育电影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电影,是当时中国电影的双子星座。到了 40 年代后期,教育电影这一电影类型消失了。那么,什么是教育电影?为什么在商业电影之外,会出现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电影?教育电影又呈现怎样的样貌?本书首次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对于教育电影的起源,目前有的说法值得商榷,比如,把教育电影的源头归于 20 世纪初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认为这是国内教育电影的源头。

其实,国内真正有“教育电影”一说,是在 1931 年 12 月。当时国际教育电影专家、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随同国际联合会中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中国电影,带来了大量国际教育电影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并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从此,“教育电影”传入我国,政府机构和民间力量开始参照这些教育电影,拍摄中国自己的教育电影。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教育电影多是以科教片、社教片为其主要的存在形态。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首先，教育电影是一个独立的类型，并不依附于别的电影类型存在。教育电影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大师，像罗家伦、陈裕光这样的大教育家，像陈立夫、褚民谊这样的高官，像郑正秋、孙瑜这样的电影大家，都加入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为之鼓与呼；而且，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官营电影机构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也在新闻片和戏剧电影之外，摄制了大量的教育电影。此外，1942 年，陈果夫以教育部的名义主持成立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他还编著了教育电影剧本故事集《饮水卫生及其他》；而陈立夫则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主管领导。在当时，教育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在官方和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无须依附其他电影类型存在。

其次，教育电影与科教片并无密切关联。教育电影是民国电影的一个类型，而科教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类型，虽然两者名字中都带有“教育”二字，也都承担着教育的功能，而且民国的教育电影在金陵大学也曾被称为“科学教育电影”；但两者并无传承关系，新中国的科教电影并非脱胎于民国的教育电影，新中国从事科教电影工作的人也和孙明经等老一代教育电影人并无太多交集。

至于社教片和教育电影，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且电影里是否存在社教电影还需探讨，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社教片，更多的是指电视片中一个曾经存在的类型。

在民国教育电影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科教片和社教片，因此说民国教育电影以科教片、社教片为其主要存在形态，尽管通俗易懂，便于读者的理解，却也容易产生误解。

二、孙明经和教育电影的渊源

一种电影——“教育电影”，一个人——“孙明经”，这是本书研究的内容。那么，孙明经和教育电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教育电影的集大成者为什么是孙明经，而不是别人？

对此,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说法,大意是:孙明经的父母是摄影师,是中国电影的先驱之一,孙明经的父亲和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关系密切,陈裕光又同蔡元培有交情,这样孙明经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被培养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影专职教师,并被蔡元培等人赏识与重用,进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拍摄教育电影,终成一代大师……

笔者认为孙明经同教育电影结缘,更多的还是时代和历史的一种选择,得益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

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注定是孙明经人生中的大事,但此时的孙明经似乎对此并无意识;21岁的他是忧伤的,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一开始选择了国产电影的中心——上海,作为推行教育电影、实施电影教育的实验区,并成立了上海分会来开展工作,但上海的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经费短缺是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中国电影协会不得不改变思路,转向南京,立足南京推行教育电影。在南京,行政平台是其巨大的优势,发展空间也比上海要宽松,但经费问题同样存在,同时人才和技术问题是协会必须解决的;而与南京当地部门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出路所在:经济上同南京的八大影院合作,收取教育电影费,人才和技术上则同当地的高校合作。

当时南京的高校中,最著名、最有实力的是公立中央大学和私立金陵大学。中国教育协会同中央大学的关系更为紧密,但中央大学并无推行教育电影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两者合作必须从零做起。当时教育电影协会非常迫切地开展教育电影运动,同中央大学合作从零做起有点来不及,而金陵大学则具有推行、摄制教育电影的基础和优势,同时,金陵大学也需要在全国性的平台上发展自己的教育电影事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1934年的春天,孙明经毕业了,同届的同学有的留在了理学院任教,有的离开了母校,而孙明经介于二者之间,进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担任理化教员。

1935年的秋天,金陵大学理学院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始合作,需要一个专职摄影师来摄制教育电影。由于理学院的主要工作并非摄制电影,魏学仁院长,潘澄侯、范德胜等教授们也拿不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事儿,而在年轻

教师中,能在教学科研之外,有能力、有时间、并且不计较干活多而拿钱不多、去专职摄制教育电影的,恐怕也只有附中的教员——年轻帅气、充满激情、出身电影之家、既懂电影艺术、又懂电影技术的孙明经了。

1935年的秋天,孙明经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唯一的摄影师。对孙明经而言,这个机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但他获得这个机遇,并非得益于某些人的赏识和重用,因为对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金陵大学理学院而言,这个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在当时像孙明经这样的电影人才,他们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即便是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教育厅,当时要摄制教育电影都无人可用,可见这种摄影人才的匮乏。

从此,孙明经走上了教育电影之路,1936年他摄制的《防毒》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从此,中国电影协会双轨并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走向高峰;而孙明经也凭借自己的努力,终成一代电影大师。

三、关于孙明经和教育电影的几个说法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教育电影和孙明经的说法,散见于一些著作当中,值得质疑和商榷:

说法一:1940年,孙明经带着学生段天育完成川南雷波县、马边县、屏山县、峨边县考察拍摄。

笔者考证《雷马屏峨》一片非孙明经和段天育所摄。至于说段天育是孙明经的学生,则是错误的。段天育,在《金陵大学校刊》和《电影与播音》中也写作“段天煜”,是理学院物理系学生,堪称孙明经的同门,曾任学生自治会干事。孙明经于1934年春季毕业,段天育则是秋季毕业,两人同一年毕业(当时金陵大学学生分春季和秋季毕业)。毕业后孙明经去了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段天育则去了孙明经第一次毕业时去的安徽萃文中学,但和孙明经一样,段天育不久也回到了金陵大学理学院,进入教育电影部任职。所以,应该说段天育是孙明经的师弟、同事和下属,而非孙明经的学生。关于《雷马屏峨》,笔者在书中还会有详细的考证。

说法二：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建立科学电影教育委员会……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据1930年10月24日的《金陵大学校刊》第一版《理学院近讯》报道，“为求该院对外推广科学知识，增加内部设备及联络教职员学生与外界感情起见，特设立推广、发展、交际委员会分别主持其事……”。从《金陵大学校刊》的报道看，1930年并没成立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到了1934年10月22日，《金陵大学校刊》第一版《理学院推广委员会改组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一文，才报道了推广委员会改组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的事宜。

说法三：九一八事件爆发……陈裕光邀请蔡元培到南京金陵大学为电影教育委员会作“电影与教育”的学术演讲，蔡元培携弟子郭有守抵达……孙明经担任书记员，记录并整理了蔡元培的演讲，整理稿得到蔡元培和郭有守的赏识。

笔者前面提到，1931年时金陵大学并无电影教育委员会。此外，蔡元培到金陵大学演讲一事，笔者翻阅当年的《金陵大学校刊》，并无相关报道。倒是在1931年5月，张学良到金陵大学演讲，《金陵大学校刊》在5月15日、5月22日连续两期做了报道，都是在第一版，而且5月22日那期还是头版头条。按说蔡元培到金陵大学演讲，报道的规格是绝不会低于张学良的，何况还是受陈裕光校长之邀，带着教育部专员、科长郭有守一同抵达的，不知为何《金陵大学校刊》中找不到相关报道？所以，这种说法可信性不大。

说法四：蔡元培、郭有守为在经济上支持孙明经拍电影，专门立法一项，在南京建立“教育电影捐”，从此捐所得中拨款补助孙明经拍电影用。

金陵大学理学院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后，给予孙明经拍摄影片的经费是4000元，这笔钱确系来自“教育电影捐”的拨款，但设立“教育电影捐”，却并非是为了支持孙明经拍电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上海试点失败后，转向南京，立足南京发展教育电影事业，为解决经费短缺问题，1934年9月，总务组副主任鲁觉吾提议，在南京八大影院放映商业电影时加映教育电影，收取“教育电影捐”。而理学院同教育电影协会的合作是在一年以后的1935年的10月，孙明经也是从这一个月起薪。因此设立“教育电影捐”，跟这次合作、跟孙明经并无多大关系。此外，“教育电影捐”的设立也谈不上是一项立法，对于南京的八大电影院而言，所谓“教育电影捐”，基本上是行政压力之下的一种认捐行为。关于“教育电影捐”的设立，笔者在正文中还有论述，此不赘述。

四、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化教育运动的不同

当前,学界还有一种说法,是关于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和中国电化教育运动的,这种说法认为:郭有守、张冲、陈礼江合并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发起电化教育运动,教育电影运动在我国升格为电化教育运动。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并非一种层递关系,即所谓的“升格”——前者不存在了,升格成后者了。这两个运动其实是并行不悖的。

1936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推行电化教育,推进电化教育运动,但教育电影运动并未因此消失,而是继续发展着,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金陵大学、“中电”、“中制”等机构继续支撑着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孙明经等人开始自制教育电影,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真正实现了推行与摄制的双轨并行,迎来了自己的运动高峰。

此外,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民政府宣传部、教育部、内政部三部合组的机构,由三部的部长以及罗家伦共同领导,相比于电化教育运动的领导机构——教育部,从行政级别来看,说电化教育运动规格高于教育电影运动显然不合适。

这两个运动都有教育部的人挑大梁,但基本上不是同一套人马,教育电影运动是郭有守、彭百川等人,电化教育则是陈礼江等人。1936年教育部和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电化教育培训班,陈礼江还担任了班主任。

孙明经在两个运动中虽然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但时间不同。孙明经是从1938年理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成立,尤其是1942年美国考察归来担任电化教育专修科主任之后,其工作重心始从摄制推行教育电影,转到了电化教育上,而1942年以后,教育电影运动已经式微,电化教育运动正迎来高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大小小的运动很多,有的运动看起来很相似、容易混淆,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化教育运动就是这样,这两个运动有共同之处,都是用电影实施教育,都有教育的共性,也都有救国救民的终极目标,但从专业属性上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场是电影运动,一场则是教育运动。

教育电影运动是以电影为核心,围绕着电影展开的:在当时,电影作为新兴事物,发展蒸蒸日上,对国民充满吸引力,但相当一部分国产商业片和进口片诲淫诲盗、唯利是图,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于是有识之士努力规范电影,试图用教育电影来抵制无良电影,对国民实施正面教育。

至于电化教育运动,但据笔者理解,它是教育领域的一场运动,它的源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种教育救国思潮,它试图采用新工具、新方式来解决一直存在的老问题——愚、贫、弱、私等。电化教育运动同当时教育部推行的其他运动,如“识字运动”、“国语运动”一样,都是围绕着教育展开的,只不过采用了电化工具,而在这些电化工具中,电影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除了电影,还有播音(广播)、幻灯片(静片)等,到了40年代,孙明经、杜维涛他们更多地采用了比较经济的静片来推行电化教育,而不是成本相对昂贵的电影。

对于教育电影和孙明经的研究和阐述,笔者本着以史料为准的原则进行,通过搜寻史料、考据分析,力争还原史实,没有史料支撑的,本人不敢人云亦云、妄下断语。此外,书中引文保留民国纪年。

目 录

>>>>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教育电影的兴起 /1

一、什么是教育电影 /1

二、教育电影的分类 /4

三、教育电影兴起的国际背景 /8

四、教育电影兴起的国内背景 /13

第二章 中国教育电影运动 /20

一、电影检查的起源 /20

二、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 /21

三、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 /24

四、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 /25

五、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29

六、郭有守与彭百川 /33

第三章 教育电影的发展 /36

一、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发展 /36

二、上海分会试点失败 /38

三、转向南京 /44

四、自制教育电影 /47

五、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教育电影事业 /51

六、院长魏学仁 /55

七、合作 /57

八、孙明经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60

九、抗战期间的合作 /63

第四章 孙明经教育电影概述 /66

一、孙明经的媒介电影观与劳工神圣思想 /66

二、孙明经的教育电影 /71

第五章 工业常识电影 /79

一、工业影片概述 /79

二、工业影片考证 /84

三、工业常识电影的分类及其价值 /87

四、工业常识电影之美 /94

第六章 地理风光电影 /101

一、地理风光电影的数量 /101

二、起点之作《苏州名胜》和《上海》 /103

三、万里猎影 /106

四、两次西康之行 /109

五、《雷马屏峨》考 /113

六、西南科考 /116

七、地理风光片的分类 /119

八、地理风光片的创作个性 /123

九、地理风光片的摄影特点 /127

第七章 国防常识电影 /134

- 一、国防常识电影数量少的原因 /134
- 二、官营电影机构 /134
- 三、孙明经成名之作《防毒》 /138
- 四、《广西民团》 /142
- 五、《防空》 /145

第八章 自然科学电影 /148

- 一、关于影片的数量 /148
- 二、两次日全食电影 /149
- 三、《信鸽》 /159

第九章 农事电影 /162

- 一、影片考证 /162
- 二、农事电影的特点和价值 /168

第十章 公民电影 /171

- 一、《童子军》和《国术》 /171
- 二、《女子体育》与《健身运动》 /175
- 三、《注音字母》《看图识字》《识字运动》 /180
- 四、《乡村建设》和《新县制》 /182

第十一章 孙明经的其他电影 /186

- 一、儿童影片 /186
- 二、纪录电影 /189
- 三、娱乐电影 /194
- 四、其他电影 /197

结 语 /202

附录一 孙明经作品年表 /203

附录二 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摄制十六毫米动片目录 /213

附录三 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概况·摄制概况 /216

附录四 《防毒》影片摄制经过及说明 /220

附录五 理学院上学期映放科学电影报告 /230

附录六 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的履历考 /232

附录七 孙明经月薪考 /239

参考文献 /241

参考影像 /243

第一章

教育电影的兴起

教育电影是中华民国时期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有别于当时的商业电影,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教育电影运动,这场电影运动同左翼电影运动并称为三四十年代的两场重要电影运动。

“教育电影”并非我们熟悉的定名于 1953 年的“科学教育电影”。“教育电影”这一电影类别,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短的十几年间。

一、什么是教育电影

1931 年 12 月,国际教育电影专家、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随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中国电影,旨在推行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和国联关于教育电影事业的开始”^①。萨尔地在给国联的工作报告中写道:“教育电影问题,中国人士,似未前闻,故公众意见,对之咸感兴趣”^②,“当地中外报纸,对于教育电影问题,极有兴趣,皆刊载余之演讲,广加批评,无微不至,引起全国人士,对于是项有关政治及智慧之新兴重要问题的群起注意。”^③

论及教育电影时,萨尔地说:“以余之意见,凡电影片之能增加人民的政治、

① 郭有守:《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1935 年版,第 8 页。

② 〔意〕萨尔地:《电影与中国》,彭百川、张培藻等译,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1934 年版,第 5 页。

③ 同②。“当地”指的是上海,萨尔地先到了上海,后又考察了南京、北京等地。

社会、艺术及技术等知识者，皆得称为教育影片”^①。萨尔地还规划了教育电影的范围，认定教育电影包括：有扮演各国大事（包括扮演地方事件之足可借鉴者）的新闻片；有扮演各国天然风景的风景片；有扮演工艺学校之教科的职业训练片；有扮演各国国内及国外实业如筑铁路、造船、汽车、筑路、筑桥的实业片；有扮演如何预防并诊治传染病如肺病、天花、疟疾、梅毒等的卫生及疾病预防片；有扮演范围最广，自昆虫生活以至于结晶矿物，自植物胚芽以至于光之应用法等科学片；有扮演耕种机器之不断进步情形的农学影片；有扮演军令行动之绝对一致性的军事影片；以及扮演其他施行外科手术、动植物、艺术历史、及放大影片等等之类。^②

萨尔地对教育电影的阐述，代表了当时国际上对教育电影的一种权威认识。当时意大利的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起，是教育电影推行最成功的两个国家。

萨尔地对教育电影的阐述，是我国对“教育电影”最早的记录。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开始推进中国教育电影运动。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著的《中国电影年鉴》提到“本会认为电影虽为娱乐消遣之工具，但除娱乐消遣之外，尚含有教育之意义，因此一切电影片，皆可视为教育电影”^③，给出了教育电影一个非常宽泛的界定，同时点出了教育电影的意义。

此后，出现了几部专著论述教育电影。

1936年，宗秉新、蒋社村在《教育电影实施指导》一书中指出：“凡是含有促进人类对于自身、对于世界、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改变，以合于人生需要或公共福利为目的的材料，而用电气电光的机械，将这些材料的形体、关系、动作或声音、颜色表现在银幕上，藉视听的官觉，以灌输民众而达到上述目的的，就叫教育电影。”^④这个定义更多地从哲学和技术层面对教育电影作了阐述，并特别强调了教育教育的教育属性。宗秉新、蒋社村还否定了当时一种关于教育电影的说

① [意]萨尔地：《电影与中国》，彭百川、张培深等译，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版，第9页。

② 萨尔地的阐述涵盖了中国后来兴起的教育电影的范围，但略显宽泛；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电影是不包含新闻电影在内的，从孙明经主编的《电影与播音》来看，新闻电影、纪录电影、教育电影是平行的概念，一起被称为纪实电影和戏剧电影。

③ 《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997页。

④ 宗秉新、蒋社村：《教育电影实施指导》，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法,这种说法认为“凡电影都有教育的作用,所以实际上都是教育的电影,不过,它的作用为正为负却有分别罢了”^①,按照这种说法,教育电影不仅应包括一切积极向上的电影,也包括一切有负面作用的,甚至海淫海盗的电影。这一说法遭到两人的反对,认为“普通所谓教育,自然是指经过选择的,是指积极正面的意义”^②,那么教育电影也就不应包含有负面作用的电影,从而避免了教育电影概念的泛化。

同年,宗亮东在《教育电影概论》中指出:教育电影就其意义而言,“一般地可以有广义狭义的区别,就广义的而言,凡是与社会教育有关系的一切影片,无论为国民生活的介绍、社会道德的鼓吹、宗教艺术的宣扬、通俗科学的传播、保健卫生的指示、时事问题的解说、休闲娱乐的欣赏以及各机关的业务宣传,都应该属于教育电影的范围之内。狭义的则限于学校教材影片,如关于知识的获得,情意的陶冶,技术的传习,如看到这些教育的目的而摄制的教育影片都得称为教育电影”^③。宗亮东认为狭义的教育电影限于学校教材影片,虽然突出了学校教育,但忽视了社会教育,对狭义教育电影的范围界定显得过小。

1937年,谷剑尘在《教育电影》中指出,“所谓教育电影是以教育的立场为教育而特制的影片”^④。谷剑尘从教育电影的目的、立场、手法等角度概述其内涵,同时涵盖了关于教育电影广义狭义的范围,并且用语简洁,符合定义规范,对于教育电影比较成熟的认知和阐释。

总而言之,从前人对教育电影的阐述来看:教育电影不包括所有电影,那些海淫海盗的电影不是教育电影。“教育电影其本质上讲,是用电影来做实施教育的工具。”^⑤

教育电影的目的很明确、人们对教育电影的认识也很统一,那就是用于教

① 宗秉新、蒋社村:《教育电影实施指导》,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

② 同①。

③ 宗亮东:《教育电影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8页。

④ 谷剑尘:《教育电影》,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58页。

⑤ 同④。